

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 刘东超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出自《荀子·天论》，大意为各种事物必须具备适宜的条件才能生长，必须具备合适的“养料”方能形成。这体现了荀子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也蕴含了物物相依、并育不悖的发展理念。

天地合而万物生

古人以天地为万物化育的载体。荀子言：“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贾谊《鹏鸟赋》进一步喻之：“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二者皆以阴阳为天地化育的核心动力。《黄帝内经·素问》则称阴阳为“万物之纲纪”“生杀之本始”。

仅以阴阳解释化生，尚不足以尽其妙。董仲舒《春秋繁露》言：“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他将天地化育视为天道仁德的显现，赋予自然之天以道德人格属性；此处的“仁”，既是天地生生不息的意志，也是万物生长所依托的正向条件与动能。古人进而认为，化育之功源于“中和”。《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万物的本然根基，“和”是万物的运行法则；“致中和”即守其本、顺其道，使万物各得宜、秩序协调。

人亦天地所生，又在万物中独具灵秀，为天地之心。《列子·天瑞》谓：“天生万物，惟人为贵。”这是中国哲学对人之地位的经典定

位。董仲舒亦言：“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二者皆强调人禀天地精气，独具灵秀。《黄帝内经·素问》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既明人之尊贵，亦言人受自然塑造、当顺时序而动。王阳明《传习录》提出：“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又谓天地万物“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意为人心承载天地的灵知，人与万物同属一体、气息相通，正是天地之“仁”的落脚处。

山泽时禁鱼鳖长

古人视山川为天地一体的组成部分。《周易·坎卦·彖传》云：“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认为天地山川气脉贯通。文天祥《正气歌》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为护持天地和气、效法天地之仁，保障万物生息，古人对山川湖泽施行“禁发有时”的规制，多载于历代典章。

《逸周书·大聚解》载周公所述“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相传大禹之时已有禁令：春季禁伐山林，夏季禁捕川泽，为动植物留足生长周期。《礼记·月令》按月设禁，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麝，毋卵”，保护初春幼弱生灵。《唐六典》规定渔猎依时序而行：“冬春之交，水虫孕育，捕鱼之器，不施川泽。”又载：“凡五岳及名山能蕴灵异，兴

云致雨，有利于人者，皆禁其樵采，时祷祭焉。”凸显山川涵养生态、孕育珍稀物种的功能。《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等历代法典，均有类似条款。

中国历代亦多有官员推行山林湖泽封禁的措施。东汉合浦郡盗采珠贝，珠蚌迁徙、资源枯竭；孟尝任太守，严令禁捕，未及一年珠蚌复还、生态恢复。明万历年间，崂山林木遭私伐，即墨知县许锜刻石立禁，严惩擅伐，交由华楼官道士与地方保长管护。清道光年间，梵净山林木遭私卖烧炭，铜仁知府敬文立碑护林，《梵净山禁树碑记》云：“草木者，山川之精华。山川者，一郡之气脉……勒诸石，永以为禁。”左宗棠督办西北军务时，见安定县百姓烧荒，告谕知县：太平之世无需以此御敌，“况冬令严寒，虫类蛰伏，任意焚烧，生机尽矣，是岂仁人君子所宜为？”随即通令陇东南、宁夏一体严禁。这些举措出发点虽有不同，但核心皆含生态保护之意，已深刻认识到自然环境是万物与人类存续的根本依托。

众类并育不相害

万物得和以生、得养以成的突出体现为物种间相依相存、协同共生，相关实践多见于古代农桑生产的记录中。如唐末刘恂《岭表录异》记载：新州和泷州的人买来鲩鱼（草鱼）苗放入新开垦的稻田。一两年后鲩鱼长大，吃光水中杂草。通过这一方法不仅收获了大量的鲩鱼，还由于鱼的活动把荒地变成了熟田，种稻也没有稗草的干

扰。由此形成鲩鱼、水稻、水田三者互生共利的生态链条。两宋之际陈勇所著的《农书·地势之宜篇》亦载：在雨水容易汇聚的地方掘为陂塘，堤上种植桑柘之树来系牛，“牛得凉阴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泔水以灌溉，潦即不至于淤漫而害稼。”牛、堤、桑、稻互为支撑，兼顾防洪、灌溉与种植、养殖效益。

中国南方桑基鱼塘模式，“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至明代已日趋成熟。在这一体系内，资源循环利用高效且集约。江苏常熟一带亦有类似的生产方法：在低洼的地方挖掘围有高埂的鱼池，池上用木梁架上笼子养鸡和猪，粪可以养鱼。“滕之上植梅、桃诸果属。其汗泽则种菰、苽、菱、芡。可畦者以艺四时诸蔬，皆以千计。凡鸟鳬、昆虫之属，悉罗列而售之。”其品类之繁、系统之完备，更甚于桑基鱼塘。清中叶，杨岫在《知本提纲》中总结北方农田用肥之法：“即如稻田宜用骨蛤蹄角粪、皮毛粪；麦粟宜用黑豆粪、苗粪；菜蔬宜用人粪、油渣之粪是也。”强调需依据作物特性选配合宜肥料，经长期实践匹配选分、提升产量，正是“各得其养以成”的生动例证。

唯有顺天时、因地宜，遵循万物生长的客观规律，方能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



海外典藏和传播中华文献的重镇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百年传承与数字化新篇

□ 徐 修

哈佛燕京图书馆以收藏、研究和传播东亚文献著称，是美国哈佛大学最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之一，也是全球最重要的中华文献收藏中心之一。作为海外保存和传播中华文献的重镇，哈佛燕京图书馆在跨越国界的往来中见证中华文脉的恒久传承。

一脉相承的燕京学社与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初。1928年，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推动下，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依托美国实业家查尔斯·马丁·霍尔的遗产基金，共同创立“哈佛燕京学社”，旨在促进中西学术对话、培养国际中国学研究人才。学社的设立，推动了海外现代汉学研究的制度化发展，成为20世纪东西方学术合作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31年，哈佛燕京学社的汉和图书馆迁入哈佛大学校园独立运营，实现独立建制。学社在北平燕京大学设立购书办事处，就近采购典籍。同年，美籍华裔学者裴开明被聘请为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首任馆长。图书馆初期以收藏中文、日文典籍为主，逐步拓展至东亚文献领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北平藏书面临散佚损毁之虞，部分藏书历经辗转运至哈佛大学。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哈佛大学持续加大对中国研究的投入，馆藏规模与学科门类快速拓展，汉和图书馆逐步成长为北美高校中规模最大、学术影响力突出的东亚文献图书馆之一。1965年，汉和图书馆更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舍、馆藏体系与学术使命一脉相承，裴开明乃是该馆的实际奠基人。汉和图书馆时期建立起的系统汉籍编目体系、馆际学术交流网络，为这一时期北美东亚文献整理与汉学研究筑牢根基。时至今日，哈佛燕京图书馆依旧坚守其学术使命，在海外新传中华典籍文脉。

体量宏富的中华文献典藏体系。哈佛燕京图书馆以馆藏丰富、



典籍完备著称。馆藏总量约150万册，其中中文文献超过80万册，包含善本古籍、地方志、近代手稿等珍贵典藏，每年新增藏书3万至4万册，馆藏规模仍在不断扩展。

在馆藏中，中文古籍约15万册、13300余部，其中善本约4000部，多为乾隆六十年以前之旧槧，涵盖宋元刻本、明清稿本抄本、套印本、活字本等各类版本。具体而言，宋元刻本存30余种，明刻本1400余部，清初刻本2000余部，稿本、钞本1000余部；版本形态上，既有彩色套印之书，亦有明代铜字活字本及清代木活字本，可谓琳琅满目。丛书收藏尤称宏富，有1400余部，仅《中国丛书综录》所收者，半数即可在此获见。此外，毛氏汲古阁抄本、《永乐大典》残存两册等亦具有极高文物与文献价值。

除传统古籍外，地方志收藏为哈佛燕京图书馆另一特色。据第二任馆长吴文津著《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国方志及其他有关资料收藏现况》统计，以当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的存世方志总量为参照，该馆所藏方志种数约占46%，卷数约占59%。时间跨度自明清以至民国，内容涉及地方行政、社会风俗、经济变迁诸端，为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系统而翔实的史料支撑。与此同时，科举文献、碑刻拓片、族谱档案亦在馆藏中占有相当比重。

哈佛燕京图书馆对近现代出版物的收藏亦用力甚深。从20世纪初的《东方杂志》《新青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日报》《红旗》，再到当代学术期刊与电子数据库，几乎完整覆盖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段。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图书馆珍藏大量与中国抗日战争相关的原始史料。如《费慰生夫妇档案》内容丰富，所留第一手资料真实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造成的深重灾难、中国抗战国际宣传的艰辛历程以及战时中美关系的演变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此外，馆内还保存着一批埃德加·斯诺访问陕甘宁地区时收集的红军文件、印刷品、期刊等，这些资料铭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英勇斗争、反抗外来侵略的不屈斗争。

学术对话中的数字化典藏新篇章。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海外中国学与国内学界深度联结的学术桥梁。近百年来，无数中外学者在此治学研读，留下了跨国交流的深刻印记。从费正清到杜赞奇，从孔飞力到包惠德，一代代蜚声国际的汉学大家在此展开系统而深入的学术研究。他们的代表性成果不仅推动了海外中国学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学界对中国的整体认知。

哈佛燕京图书馆长期与中国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保持密切合作。

近年来，这种合作更趋多元，数字化文献建设、数据库互通等方面成果丰硕。以中文善本特藏的系统整理为纽带，哈佛燕京图书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浙江大学图书馆开展多方协作，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献合作网络，共享内容涵盖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经史子集四部善本、民国时期文献、中文拓片等丰富门类。2025年2月，哈佛燕京图书馆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中文善本、方志、丛书等古籍数字资源；2026年初，首批资源正式在国家图书馆平台发布，纳入中华古籍资源库和中华古籍智慧化服务平台，全球读者均可免费访问。

进入数智时代，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布局主要围绕大规模馆藏数字化、开放获取与全球协作、主动引领数字人文研究三个层面展开。大量原本需亲赴美国方能查阅的珍稀典籍，如今已通过高精度扫描和电子数据库形式向全球开放，极大地方便了中国学研究的开展。仅就中文善本特藏而言，馆藏4200部、计53000卷的数字化工程已全部完成，整个项目耗时10年。2025年底，哈佛燕京图书馆捐赠的古籍数字化资源在“识典古籍”平台开放利用，人们得以一睹宋刻《十通律》、元刻《隋书》、明抄《永乐大典》、清抄《杜诗》等稀世典籍的高清书影，还能检索到齐思和、顾颉刚、容庚等古籍校勘与文史研究者留下的校勘痕迹与研究路径。

对一代代中国学人而言，哈佛燕京图书馆为其涵泳典籍、启沃新知。学者们在此探研经典、对话域外，使中国学术的声音在国际舞台愈发彰显。



（上接1版）人工智能在降低知识生产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学术不端的门槛。生成式工具在输出内容时普遍缺乏清晰的来源标注，严重削弱了学术引用的规范性和可追溯性。研究者若未经核查便直接使用，可能造成来源隐匿、引用失范和内容失实，甚至卷入学术不端，危及学术诚信。

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可能消解研究者的认知主体性，削弱其独立思考与原创探索能力。人工智能的普及，对人类社会知识生产和获取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但也可能弱化研究者的批判性与创新性思维，给人类的认知主体性带来现实威胁。个体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技术手段，导致其主动获取信息、进行逻辑分析和事实核查的能力被系统性削弱。如果只是被动接收人工智能提供的唾手可得的答案，也极易陷入“认知卸载”的困境。长此以往，不仅可能削弱人作为研究主体的独特创造力，还可能导致学术创新停留于表面整合，影响整体研究质量。

推动人工智能和哲学社会科学双向赋能深度融合

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统筹推进科研组织模式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复合型人才培养、学术伦理规则完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国际合作交流拓展，确保人工智能辅助研究可靠、可信、可控，夯实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构建人机协同模式，推进科研人员角色调适。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不只是研究工具的更新，更涉及知识生产中分工关系的调整。高校和科研机构应围绕重大研究任务，推动专业知识、技术力量和数据资源协同配置，探索研究者主导、人机优势互补的新型科研组织模式，使技术能力的提升与研究组织方式的创新相互促进。一是制定并动态完善人机协同的伦理准则与学术指引，明确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信息分析与辅助推理中的角色边界，防止其过度替代人类的理论创造与价值判断。同时，引导科研人员树立正确的技术观、伦理观、价值观，为人机协同模式注入价值理性，确保人工智能研究活动符合人类基本价值。二是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主动承担模型偏差识别者、人工智能数据验证者、人机协同优化者等新型科研角色，守住人类知识创造的科学底色和责任底线。这并非要求人工智能永远“不犯错”，而是在人工智能犯错时，确保人类依然具备识别错误、纠正偏差与重建真相的能力。三是巩固知识创造中人的主体角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在于批判性思维和理论建构，这是人工智能难以替代人类的关键方面，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守护和强化研究人员自身独有的独立思考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将研究问题的定义权和研究议题的设置权牢牢掌握在人类手中。

加快建设面向哲学社会科学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整合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数据资源、算力资源、知识库资源与开源工具链，建设集成“数据—计算—知识—智能”的国家级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基础平台，形成涵盖文献研究、理论构建、数据标注、硅基实验、知识生成、仿真模拟等的全程科研赋能体系。一是加快建设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数据资源库。汇聚历史档案、文献资料、调查数据、经济数据、社会数据、政务数据和案例资料等多源数据，打造标准统一、开放共享的多模态、高质量公共数据资源体系。完善数据使用授权、来源追溯和安全共享机制，提高数据资源的可获得性与可复用性。二是建设面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专用模型集群。优先发展智能文献分析、知识图谱关联、硅基样本构建、多智能体仿真模拟等科研能力，提升模型的语言理解、生成、推理和预测能力，更好适应多学科场景下的复杂研究任务。针对哲学社会科学语料多源、语义复杂等特点以及意识形态属性和价值对齐要求，鼓励利用专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对专用模型进行训练、微调和优化。三是打造自主可控、知识集成的学科智能体集群。围绕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任务，支持若干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攻关，系统整合国内外学科基础文献、专著教材、期刊论文、硕博学位论文等文献语料，面向科研和教学场景集成研发哲学社会科学智能体集群。将学术规范、公共伦理和核心价值等嵌入智能体建设，探索建立学科智能体研发、使用和管理的基础规范和指引。

着力打造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一是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人工智能素养。将人工智能基础知识、数字伦理、算法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纳入科研人

员培养体系，让每位科研人员既熟练掌握和有效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又对模型“幻觉”、隐私泄露等风险保持警惕，提升其负责任利用人工智能辅助科研的能力。二是鼓励高校布局计算社会科学、数字人文等交叉学科，推动人工智能与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等学科深度融合，开设数据科学、数字治理和批判性思维、人工智能伦理等跨学科课程，培养兼具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的复合型科研人才。三是推动教学科研深度融合，实施面向在校学生的培养计划，强化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培养数字素养和合规意识，引导学生在科研实践中不断提升驾驭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

完善人工智能科研应用的管理监督机制。人工智能科研治理不仅要防范误用和滥用，也要为负责任的学术探索创造条件。完善资源共享和科研协同机制，推动规则适时调整，为新的研究实践提供制度支持。一是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鼓励各高校和科研机构根据使用主体、研究目的、应用场景等实际，制定适合学科特点的人工智能使用披露规范。二是完善人工智能生成或辅助生成内容的审核机制。加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审核的技术供给和赋能，重点突破智能审核、社会偏见校正、不良价值取向排查等关键核心技术。夯实各学术单位的内容审核主体责任，识别并及时处置可能存在的歧视偏见、意识形态问题等风险。三是完善人工智能使用的责任认定和容错机制。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更新迭代快、应用边界不确定等特点，应统筹考虑人机协同程度、模型迭代、训练数据来源、学科特点等因素，建立动态的责任划分机制。明确科研人员在使用披露、结果核验和问题纠正等环节的合理注意义务，区分履行相应义务后仍难以避免的技术性失误与隐瞒使用、疏于核查、故意造假等行为，既为负责任的科研探索提供制度保障，又要防止人工智能被误用和滥用。四是健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工智能科研伦理审查机制。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门的哲学社会科学伦理审查机构，制定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的人工智能科研伦理指南。完善哲学社会科学数据治理制度，制定数据分级分类标准，构建敏感数据脱敏处理与可信计算机制，确保数据安全。

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丰富实践和前沿探索，为构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基石和底气。一是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判断、伦理规范等方面的深层次影响和作用机理，研判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及相应的治理机制，探索形成智能向善的理论体系。二是围绕人工智能引发的重大社会变革，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场景应用、社会治理同步开展，研究基础概念和经典理论的新内涵新特征，挖掘提炼新概念新理论，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命题。三是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中的重大现实需求，调动科研机构 and 智库力量开展前瞻性针对性研究，在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中发展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争取拿出用得上、能管用的成果，为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行稳致远提供研究支撑。

深化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交流合作。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文化嵌入性。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合作，既要遵循学术交流的一般规律，也要尊重不同文明的知识传统、数据主权和伦理差异。一是推动构建全球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合作网络，支持国内院校与国外顶尖学术机构围绕共同问题开展联合研究，加强研究方法交流和国际科研资源共享。二是推动发起跨境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共享联盟，建设跨境可信哲学社会科学数据空间生态链，在遵守各国数据法规和伦理规范的前提下，为部分社会调查数据、国际比较数据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流通提供技术保障。三是积极参与知识生产规则制定，推动建立大模型社会影响评估国际标准，重点评估大模型的社会风险、伦理责任和学术影响。四是积极讲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故事，促进经验分享与文明互鉴，为拓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国际理论前沿贡献中国智慧，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中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人工智能推动社会实践和知识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既提出了新的理论课题，也为认识社会、创新理论提供了新的手段。人工智能越发展，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人文滋养、理性思考与价值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拥抱技术变革中保持独立思考，在推进知识创新中坚守价值追求，将历史机遇转化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际成果，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实现更稳健、更高质量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